

第三章

明确核心，接受领导

(1945.9.—1949.9.)

第一节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为和平建国而斗争

一、共产党为和平建国不懈努力

(一) 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方针

1945年8月15日，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向往着和平，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国民党则盘算着如何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恢复和加强它在全国的独裁统治。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爱国与卖国的斗争成为战后国内斗争的基本内容。

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这是他的既定方针。但由于当时全国人民，其中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高级人士，都迫切要求国内和平；从国际方面来说，世界各国人民和苏、英、美都反对中国打内战；蒋介石打内战一时准备不足，因此争取短暂的和平是有可能的。这样，国内的形势存在着内战与和平的两种可能。

中国共产党全面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方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指出在日寇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临的重大任务是：抗

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①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各民主党派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与独裁。早在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就曾发表《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与修改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选举法，召开国民大会；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的问题；裁减军队等十项主张。

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保卫抗战的胜利成果，鉴于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针对蒋介石“寸权必得，寸利必夺”的方针和发动内战的阴谋，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一方面耐心领导全国人民避免战争，寻求实现和平民主的道路；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自卫战争。因此，在日本投降前夕，共产党拒绝了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的三道命令，命令日军向我投降。同时要求解放区部队，凡能争得者应全力争之；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并且派遣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率领2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挺进东北，开辟了东北解放区。

（二）为和平民主走到一起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又由于蒋介石的军队还在西南、西北后方，全部调运到前线尚需一段时间，于是蒋介石采用反革命两手，在准备内战的同时表现一番“和平”姿态，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人民出版社，1979年。

泽东不去，就可把发动内战的责任转嫁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就可通过谈判施加压力，用威胁利诱的办法，骗取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即使谈判不成，也可以争取时间，部署内战。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和谈”目的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考虑到当时国内外的和平呼声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时也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在上述压力下，有可能经过和平谈判之后，有条件地承认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的地位。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在不放松武装自卫准备的条件下，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尽可能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中国社会，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标；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方针，准备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出某些让步。同时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如果国民党胆敢发动内战，我们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在这个通知中，中共中央还第二次（第一次在七大上）把民盟列为同国共两党平等的地位，对于民盟来说，是在政治上作了最大的支持。

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受到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等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上发表讲话，强调“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对一切重要问题和所有争端，国内各党派“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号召“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①

① 解放日报，1945年8月30日。

8月30日，民盟领导人、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等5人，在桂园看望毛泽东，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同一天，毛泽东在桂园举行宴会，招待民盟领导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张申府、冷御秋和柳亚子、王昆仑等。9月2日，民盟中央举行宴会，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第二天，黄炎培、章伯钧等5位参政员又在中央研究院举行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的宴会。此后，中共领导人还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多次商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介绍了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阐明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主张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从而得到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推动了重庆谈判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民主党派人士在重庆谈判中也积极发挥了他们的政治作用。鉴于国共谈判中国国民党拒绝承认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民盟中央常委、第三党领袖章伯钧，于9月13日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凡我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同时强调指出：应合理妥善地解决解放区军队和政权问题，“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①黄炎培还建议国共两党应一面继续谈判，一面就着手准备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即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意见被国共两党采纳。

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之间一场尖锐的政治较量，在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在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全国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国共两党终于在10月10日签署了对人民有利的

^①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4日。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虽然在解放区的政权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但是国民党不得不表面上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党派平等合法的原则，保证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并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在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广泛接触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尤其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多次与他们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支持他们提出的早日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会议的主张，鼓励他们为民主和平而斗争，与民盟形成了亲密的关系。如民盟主席张澜在谈判期间就提醒毛泽东说：“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帐。”毛泽东欣然采纳，当即考虑对策。张澜感到义所当为，毅然对毛泽东说：“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①毛泽东又欣然采纳，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张澜的公开信，随即分送给重庆的《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报》上刊出。张澜在公开信中着重谈到军队问题，指出：一方（意指国民党——笔者）要一党专政，因而训练党军，以图巩固其政权，即不能禁另一方（意指共产党——笔者）之训练党军，与之对抗。必须实行民主，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公开信对于恃强权以凌弱，拥重兵以暴寡的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给予了有力的指责。这表明了民盟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张澜在得知蒋介石以武力解除了他的老朋友龙云在云南的权力时，对毛泽东的安全忧心如焚，立即派人通知周恩来，敦促毛泽东早日返回延安。毛泽东还与国民党内的民主人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4，443—444

士宋庆龄、冯玉祥等人以及正在筹建的民主党派组织的人士陈铭枢、柳亚子、王昆仑、章乃器、胡西园、陶行知、史良、许德珩和无党派人士章士钊等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勉励他们组织起来，与共产党团结一致，为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所作的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与认识，消除了顾虑，加强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共的团结。各民主党派与爱国人士也真诚以见，出谋献策，如毛泽东找章士钊叙谈时，征求其对当时局势作何分析，章士钊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应乘他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速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中国共产党分析形势时很重视章士钊的意见。后来历史也证明了章士钊的这一预见是正确的。

总之，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的方针，在蒋介石的真面目还未完全暴露的形势下，尽管有的民主党派人士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并以第三者的立场提出解决国共争端的主张与建议。但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不约而同地为争取和平民主走到一起，开创了在新形势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局面。

二、民主党派的发展壮大和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

（一）共产党支持、帮助民主党派成立，壮大了人民民主力量

抗战胜利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治舞台上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和经济上的垄断，对国民党的劫收、掠夺愤懑不平。他们认为战后的中国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只有实现“民主政治”和解除对民族资本的种种束缚才可能使民族资本真正发展起

来。抗战中，尽管民族资产阶级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却是在帝国主义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着，并且没有一点政治地位，他们所得到的权利与他们曾经向往的资产阶级政治大相径庭。他们中有些人也不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目前在国共两党力量相持的局面下，正是他们在“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但由于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是他们实现“民主政治”的极大障碍，因此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与蒋介石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当时，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他们的主张不切合实际，在中国难以行得通，但他们要求民主政治，反对内战独裁是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否定，与共产党的方针具有某些共同点。共产党尽一切努力争取、团结和教育他们参加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之中。蒋介石为了粉饰其“民主”的门面，并在斗争中孤立共产党，也极力分化和拉拢他们。

中国民主同盟、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这时都积极扩大组织，发表政治宣言与主张，开展各种活动。

在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中国民主同盟于1945年10月1日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等文件，强调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实现“军人主军、文人主政的原则”，发展民族经济等。由于民盟当时是除国共两党以外最大的政党，包括了三党三派及其他社会贤达，他们解决时局的主张与中共战后提出的和平民主方针基本一致，特别是他们在实践上与共产党合作行动，因而成为民主党派中很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是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了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发挥组织的战斗作用，从1945年秋季开始，就陆续整顿和恢复各地方组织，中央机关由重庆迁到上海。为了揭穿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5年11月12日发表了《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谴责蒋介石发动内战和美帝以大量武器助长中国内战的罪行。呼吁全国人民对于当前危害国家的内战，须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加以制止，起到了共产党当时起不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新的民主党派纷纷成立，发表声明及政治主张，民主力量空前壮大。这些新党派中有不少的组织在筹建过程中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秘密成立。民联是中国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而建立的政治组织。其会员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国民党内党龄长、资历深、地位高、影响大的上层人物，并且在他们周围已经聚集了更多的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国民党人士。不久，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于1946年4月14日在广州秘密成立。民促和民联不同的特点是，民联多数成员是国民党政界人士，军人很少；民促中则国民党军界人士很多，十九路军的骨干多数都参加了民促。民促和民联都宣布：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要求国民党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

民联和民促的成立，犹如蒋介石的后院起火，立即在国民党内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产生了影响，表明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和行径已引起了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极大不满和反对。特别是民联成立之后，得到了国民党内反蒋人士的普遍支持。冯玉祥与李济深、陈济棠不仅支持且还参加了民联。云南和四川的实力派龙云、刘文辉等人也通过有关方面表示赞助和默契。民联和民促的成立起到了分化国民党、促进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积极作用。

民主建国会于1945年12月正式成立。发起人黄炎培在筹建时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徐冰随时通报情况，得到了中

共的帮助和支持，一些中共党员还参加了民建的筹建工作。民建的主要成分是一部分民族工商业和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政治主张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反映了当时濒于破产的广大中小工商业者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矛头是指向国民党及四大家族的，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与中共的最低纲领是不相悖的。因此国民党政府对民建采取监视和戒备的态度，国民党“中央社”对民建成立的消息进行了封锁。

以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派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把自己的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以便在民主同盟中更充分地发挥骨干作用，决定正式建成一个新的政党——中国人民救国会。1945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救国会政治纲领》等文件，其政治主张是彻底消灭内战，实行一切民主改革，经过政治协商会议，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1945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在上海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它的宗旨是：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民进的基本队伍是由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和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组成，其成员大多数长期在上海工作，和上海各界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很多人在上海均有一定的声望，因而民进在上海人民中有较大的号召力和影响。

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在重庆成立。这是在毛泽东直接关心和指导下成立的民主党派，其成员大部分是文教、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九三学社正在酝酿成立期间，毛泽东到达了重庆，许德珩向毛泽东谈到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的顾虑。毛泽东指出：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也可以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在毛泽东的指点和帮助下，许德珩等决心把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性组织。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

大胜利，这个组织定名为九三学社，并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当时，旧政协会议刚刚开过，九三学社针对国民党无视政协决议，破坏停战的行径，明确主张无条件停止内战。会后，九三学社与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及民主人士一道，用各种方式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间，有5个新的民主党派先后建立。这些党派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与中共是完全一致的。这反映了在战后国际国内民主潮流汹涌澎湃的形势下，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和统治不得人心，民主人士奋起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新的民主党派的建立，锻炼和涌现了一批有威望、与广大知识分子及特定阶层的群众有着密切联系，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的民主运动领袖，壮大了人民民主力量，推动着我国民主化事业向前发展。

（二）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政治

各民主党派在恢复扩大、成立新组织的同时，投入了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运动。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之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20多家杂志社，纷纷发表宣言、评论，呼吁和平，制止内战，要求撤退美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月2日，民盟发言人发表反对内战的谈话，指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①11月1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秉“天下为公”的原则，把民主权利交还人民，并要求国共两党立即停止全国各地的军事行动，用民主方式解决任何有关军事政治的纠纷。11月中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并于11月19日在重庆举行500余人的反内战大会，呼

^①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3日。

吁和平，反对内战，号召各界人民用罢工、罢课、罢市等行动制止内战，奠定国内永久和平，并且强烈抗议美国政府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号召迅速在各大城市的人民中获得响应。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政协代表，要求国共两党于1946年元旦“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①12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立即给张澜复函，表示完全同意。

为了争取出版自由，民盟联合出版界自1945年8月开始在国统区开展的“拒检运动”达到了高潮。到1945年10月1日，在全国各党各派和出版界、新闻界、文化界一致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被迫宣布：自即日起，废除新闻检查和书刊检查制度。这是国统区民主运动斗争中的一个重大胜利。为此，《新华日报》和中共南方局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都发表社论，给这次斗争的胜利以高度的评价。《新华日报》指出：“‘自由不是赐予的’，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得来的，盼望人家来赐予，不知自己用力争取的人是会得到自由的。”^②特别强调了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了多年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废止，是人们斗争的结果。

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不顾人民反对，不断挑起内战，仅1946年1月至6月，就向各解放区进攻达4000多次，占领城市40座、村镇2650多个，内战阴霾笼罩着全国。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严阵以待，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的发生。

针对国民党不断挑起战端，各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中共揭露其内战阴谋。1946年5月，民盟对时局提出4项主张，要求全国各界同胞一致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局。5月28日，北平各界人士呼吁立即停止内战。6月，民进负责人不仅发表文章，揭露国民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10

② 新华日报，1945年10月 日。

党的内战阴谋，而且还联合其他民主人士164人致函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这一举动很快得到中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响应与支持。6月11日，中共代表团复函马叙伦，对这一行动表示钦仰，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于陆危，张民主之大意。6月19日，民主建国会发表《为挽救国运、解决国事、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文件，在上海各报刊登，指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排斥反对党不能依恃屠杀，要痛下决心奉协商至高无上的准则。

民主党派的这些斗争，与中共采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是相呼应的。它对于揭露蒋介石的假和平、真战争的阴谋，提高人们对美蒋反动本性的认识，孤立敌人，牵制反动力量，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与声势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政治协商会议和坚持政协决议的斗争

（一）政协会议上中共与民盟的密切合作

根据《双十协定》的规定，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下午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

整个政协会议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国民党企图通过这个会议使其独裁统治合法化，并采取了各种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政协会议召开前，斗争就反映在参加会议的人员名额分配上。《双十协定》商定政协会议的组成人员为4个方面的代表，即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各9人。这使得蒋介石感到国共代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民盟与社会贤达代表的态度在议别提案、决议时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国民党企图拉拢民盟与社会贤达，孤立共产党。他们双管齐下，一方面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促使其右翼与他们合作，以分裂民盟。他们对民社党的张君勱、张东荪，以及对罗隆基等，都极尽其拉拢之能事。除各有专人同他们经常个别往来以外，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大员，还轮番亲自设宴款待。像罗隆基，就由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以从小同乡和小时

同学的关系，多次请他吃饭，许以大使的职位；范予遂还和罗隆基相约，不露形迹地由罗隆基在政协开幕之日与张群“握手为定”等等。另一方面，国民党利用青年党对民盟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拉拢青年党，以求拆散民盟，使它不能成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并私下允诺青年党5个名额。于是青年党就提出，要占民盟9个名额中的5个，否则就要退出来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民盟所拒绝。

民盟作为政协会议单位之一，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在民盟陷入新的困境时，中共又一次挺身而出地为其排忧解难。周恩来等一再到特园向民盟负责人表示，民盟应有9个名额，决不能让步，希望民盟坚持这个意见，鼓励除青年党外的民盟内部，要加强团结，共同斗争。当时，国民党坚持青年党5个名额不能少，共产党坚持民盟9个名额不能动。在共产党的策略斗争下，最后决定：青年党以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占5席；民盟仍占9席。增加的名额，共产党提出自己让出2个，国民党让出1个，再增加2个名额。这样政协代表的人数由36个增加到38个。虽然共产党的名额比国民党少了1人，青年党被国民党从民盟内部拉了过去，并且使它以后奉命承旨，参加一党“国大”和它的伪政府，但是蒋介石处心积虑地要阻止民盟同中共的合作，以达到操纵旧政协的阴谋破产了。民盟内部更团结了，它与中共的关系更密切了，中共与民盟在第一个回合中取得了合作的初步成果。

由于中共采取顾全大局，主动让出自己的名额，照顾和支持了民盟，维护了民盟的地位，使民盟深受感动。他们决定和中共结成亲密同盟，在政协会议上共同对付国民党。1945年10月19日，民盟由邓初民代表与中共代表王若飞、徐冰两人会谈，决定交换情况及资料办法，规定民主同盟嗣后收得各地政治军事情报及有关文化、教育、农民、工运等资料，一律另行抄送一份至新华日报资料室。同时，新华日报资料室每周亦可开送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等资料给民主同盟盟刊《民主周刊》社。民主同盟之特殊

文件及重要宣传品，亦由新华印刷所义务承印。11月，中共代表与民盟代表又作了进一步谈判，并签订了合作协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同盟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的新中国，决定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双方同意遵守以下各条约定：（1）双方不得单独与国民党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互相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协议；（2）嗣后无论任何会议，凡中国共产党有所主张，而不违背民主同盟原则者，民主同盟有支持之义务；（3）民主同盟各分子不受共产党主张之任何拘束，唯遇有与共产党主张完全相左者，可不公开发表；（4）民主同盟在各解放区可设立支部，共产党承认协助，并与共产党地方党部，交换情况。为了开好政协会议，中共和民盟代表团都选派了很多高级人员担任代表团顾问，为政协会议服务。两个代表团顾问随时交换意见，互相合作，是民盟与中共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政协会议的成功起了良好的作用。

政协会议开始后，民盟和中共在上述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达成了一个默契和谅解即君子协定：双方如有什么重大的行动和政治主张，必须事先经过协商，以便互相配合；白天开会，晚上双方分别到对方的代表团去协商讨论第二天如何表态的策略。这一君子协定，开创了中共、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

中共和民盟的信任合作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充分显示出来：一是关于改组政府机构的问题。为了得到 $\frac{1}{3}$ 的否决权，又避免青年党与民盟对峙要名额的问题，中共和民盟采取这样一个策略，共同要14个名额，而不各提自己的名额数，这样一来，青年党就无理同民盟争论了。二是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要 $\frac{3}{4}$ 以上出席代表的同意才能通过宪法。因此，在国民大会中，民盟和中共必须争取 $\frac{1}{4}$ 以上的表决权才能发生作用。当时分给民盟是120名，中共向民盟表示，假如民盟的120名不够分

配，中共可以在解放区代表名额中予以补充调剂。总之，双方的代表名额相加，要在国民大会上达到一个否决权所需要的数字。据民盟成员叶笃义回忆，当时无论是国府委员还是国大代表的名额，中共对民盟都给予无私的支持，双方是不分彼此的。三是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在政协会议里坚持要以《五五宪草》为基础，维持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民盟和中共均坚决反对。为了彻底废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制度，民盟代表以英美的政治制度为蓝本，提出了一套修改宪法草案的方案，保留《五五宪草》的形式不变，而对国家机构的职能和权力作很大的变动。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有对行政院不信任权，立法院成员经选举产生，检察院有弹劾总统权，省为自治单位，可以制定省宪等等。在“军队国家化”和制订共同施政纲领问题上，民盟都反对国民党的主张，支持共产党的方案。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回忆，他当时在旧政协会议期间与中共代表王若飞同分在政治组中，这个小组讨论的主题是改组政府，他们共同事先认真地研究了对策。在每次开会前，王若飞总要把当天会议的战略战术向罗隆基分析一番。每次谈完话后，王若飞还要向罗隆基叮嘱几句：“你不要随便退却、轻易让步啊。”罗隆基总是笑着说：“王司令官，你放心，我不会轻易让步、随便退却的。”^①

正是中共与民盟这种一切以大局为重，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的亲密无间的合作与斗争，政协会议才达成了反映当时人民的愿望，否定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和平建国五项协议。这些协议是中共与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的胜利成果。

政协会议期间，没有参加会议的民主党派，在会外也和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举行了各种活动，对促成政协会议的成功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36

（二）坚持政协决议

政协会议取得成功后，各民主党派极为高兴，他们认为这是民主党派的重大胜利，政协路线就是他们的政治路线，感到：政协会议是“共产党让步多，蒋介石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甚至认为从此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有了保障。因而他们坚决维护政协通过的决议，并力图促使其实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一样坚决拥护政协决议并竭力实现它。政协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美联社记者谈话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明确指出了各党派当前任务“最重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①周恩来在庆祝政协会议成功联欢晚会上说：“写在字而上的文字要去做，……去执行，去遵守诺言。”^②朱德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演说时说：“我们的任务，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使民主政治一步步实现，使国内和平一天天巩固。”^③此后，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捍卫和实现政协决议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政协会议闭幕后，为了庆祝会议所取得的胜利，巩固、实施政协决议，民建、救国会、民联等各民主党派联合重庆20多个民主团体，于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大会，邀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12人出席讲话。国民党害怕大会产生影响，便派国民党特务有组织有计划地纠集打手数百人到会，殴伤大会主席团成员及群众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了较场口血案。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等同志亲赴医院慰问受伤人士。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李烛尘等11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数10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象，有的报纸上还发表了斥责暴行的社论。延安的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数10位革命知名人士致电慰问伤员，

^{①②③}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2月9日，2月6日。

并表示“誓为正义后盾”。针对国民党“中央社”为了混淆视听而发表颠倒黑白消息的行径，民建联合重庆 20 家团体发表了《向全国同胞控诉书》，揭露了国民党制造血案的真相，对“中央社”歪曲事实的报道，逐条加以辩证、驳斥。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律师史良，在事发当天，还陪同李公朴等前往重庆地方法院，验明伤情，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提出控告。较场口血案真相被披露后，陪都各界和上海、武汉、北平等大中城市及各解放区纷纷集会游行，对国民党进行抗议。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指使重庆市市长等出而斡旋，缓和事态。但他们在人民中的不良影响却无法挽回。

同一时期，农工民主党于 3 月 1 日在香港创办了《人民报》，立意是：站在中国农工平民之立场，为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实现民主政治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得到了中共的鼓励和支持。周恩来的贺词是“人民之友”，董必武的贺词是“人民之声”。《人民报》出版后，一直是围绕着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进行报道和评论，在华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配合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敌人短兵相接，《人民报》4 月 1 日迁广州出版，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及其对中共武装的造谣污蔑，对于教育、团结人民同反动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民党为了推翻政协会议的五项决议，于 1946 年 3 月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反动分子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并通过了几项推翻政协决议的反动决议。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实质仍然是要维持个人独裁的中央集权制，维护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统治。针对这种严重情况，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立即进行了斗争。3 月 18 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讲话，抨击国民党的破坏行为，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案一一加以驳斥，强调指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

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①民进的马叙伦连续发表了《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期间》、《当今一个严重的问题》等文章，深刻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政协决议，要使全国人民“再流一次政治血”的阴谋。3月20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其目的无非在维持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②表示民盟决不参加这样的政府。农工民主党的《人民报》于3月中下旬，连续发表5篇社论，明确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违反政协决议的决议案，引起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一致严重抗议。《人民报》号召：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提高警惕，坚持政协决议，加紧发动群众，去击碎反动顽固分子的最后抵抗。《人民报》一直坚持到8月，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两次而停刊。

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到南京以后，一方面对美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采取了鼓励左翼分子，稳定中间分子，孤立右翼分子的方针，大力进行了对民主人士的争取教育工作。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在中共的鼓励和教育下，及时地在南京对干部和成员作了思想动员：“要继续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③

从3月20日开始，国民党又在重庆召开了一手包办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企图利用这次会议把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政协决议非法行为公开化与合法化。中共的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也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3月31日，民盟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罗隆基发表声明，表示民盟在参加政府问题上与中共取同一态度，拒绝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成员的名单。4月，在宪草审议会上，民盟代表又与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231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53

③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301

中共代表一致反对国民党对政协宪草原则的篡改。接着，民盟在上海发表谈话，声明：“政协五项决议，是全国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同一致商定的方案。这是全国人民所接受所拥护的方案，……这绝对不容许任何党派单独否认或撕毁。”^①其他民主党派也以发表宣言、谈话、文章等各种方式，反对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民促和民联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等，为了维护政协决议，改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战独裁政策，曾在重庆积极活动，大力促进国民党内反对内战独裁政策的各派民主势力实现联合，可惜被蒋介石发现，未能成功。

上述情况表明，战后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阶段中，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主张是坚持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它成为这一时期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可以说，这个阶段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合作斗争取得了胜利，有了成果，形成了这个时期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合作的特点：

第一，民主党派与中共有着不同的政治路线，但在实际斗争中，民主党派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上又与共产党认识一致，合作行动。

由于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未完全暴露，民主党派中不少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民主党派和中共在抗战后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政治主张上，在对蒋介石的认识和评价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其合作的政治基础还只是建立在对和平、民主的共识和追求之上。民主党派不少人企图利用战后国共在力量对比上的某种均衡状态的时机，以改良主义的方式，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在政治态度上，对国共双方保持超然中立的态度；但是与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目的，又促使民主党派在某些问题上联共反蒋。然而，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这种合作尽管密切、配合默契，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88

却还停留在不自觉的同盟者的关系上。

在这个时期，民主党派能与共产党合作的另一原因是，民盟能够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因素，固然是其组织发展很快，但还有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共产党推崇民盟的地位与作用。把民盟作为除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首先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正如周恩来所说的，“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①这一点不会不为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所看到，对他们发生影响。

第二，合作斗争的形式是政治协商会议。

经过政协会议的合作，中共和民主党派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合作的新形式，即通过召开党派会议，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协商，制定共同遵守的原则（当时是君子协定）。这种合作形式，为以后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我国现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历史渊源，是旧政协会议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第三，合作斗争的方式是合法斗争。

由于蒋介石迫于形势承认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因而当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斗争也是合法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有利时机，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与蒋介石作斗争；又由于国民党企图通过拉拢各民主党派达到孤立共产党的目的，对他们的要求也作一些让步，共产党利用这一点，通过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让民主党派出面来阐明共产党的主张，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开创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合作的新局面，毫无疑问，共产党在政治上是起了领导和决定作用的。同时积累了这个时期的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历史经验，即采取十分灵活的政治斗争策略。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651

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在当时国统区人民对解放区不了解甚至抱有疑虑和恐惧，广大群众特别是民主党派还未觉悟，蒋介石政权还有一定的欺骗性的时候，如果共产党否定他们的主张与奋斗目标，不仅会失去民主党派的合作，还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党采取十分灵活的但又未放弃原则的斗争策略。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之外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只要客观上削弱了蒋介石统治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反对了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共产党就支持他们的主张，帮助他们的斗争，这对于壮大革命人民的力量也是有利的。

第二节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的内战和独裁

一、共同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一）下关惨案促使民主党派进一步觉醒

就在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时，蒋介石集团不仅撕毁了政协决议，而且变本加厉地把内战政策付诸实现。他们首先向东北地区发动战争，接着又把战火引向各解放区，形成了“关里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1946年3月，由于全国人民的指责，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但不到三天，又开始了东北之战。民盟于4月10日在重庆特园邀请国共双方座谈东北停战问题，提出了双方避免冲突，协商撤军、谈判、和平三项建议。中共接受，但国民党拒绝了。其后东北战事日益扩大，民盟再次提出停战倡议和调解方案，中共再次接受，国民党再次拒绝。民盟竭力为和平奔走呼号，但结果徒劳。

为了制止大规模内战的爆发，扩大争取和平民主力量，1946

年5月5日，由各民主党派共同发起有47个人民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宣告成立，发表了《宣言》，并向国共两党致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同时通过了关于制止东北流血事件，反对保甲制度，取消戒严法，反对不合法的市参议员选举，组建人民自由保障会等6项提案。5月2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一致决定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反对国民党政府再次发动内战。6月5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反内战宣言》。接着，又发动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他们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6月11日，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等人给马叙伦复函，申明中共的一贯主张：“决愿本一向和平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俾使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得以顺利实行”。^①并对他们的这一行动表示钦佩，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6月19日，民建发表《为挽救国运、解决国事、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文件，在上海各报刊登。指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排斥反对党不能依恃屠杀，劝告国民党当局要坚决停止万恶的内战，并热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为奠定永久和平而努力。但国民党对全国人民的要求和各民主党派的呼声置之不理，反而加快了全国内战的步伐。

正当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之时，民进提议反内战大会还应推派代表赴南京，直接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接着，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和平请愿团，推选了马叙伦、雷洁琼、胡厥文等11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并决定于6月23日在上海火车站举行反内战大会，欢送赴京代表，会后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对这次反内战运动非常重视，派了中共地下党员张执一、吴学谦等负责不同方面的具体领导。6月23日，

^① 子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221

300多个团体单位约10万余群众涌聚到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大游行。对这次请愿行动，国民党极端害怕，从大会开始到代表们登上火车，一直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但均未得逞。23日晚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了国民党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殴达5个小时。团长马叙伦和代表雷洁琼、叶笃义等受了重伤，造成了震惊中外的“6·23”下关惨案。当马叙伦等在下关车站被围困殴打时，冯玉祥、李济深曾几次打电话给国民党军政当局，要求制止暴行、营救代表出险，均告无效。据南京的记者揭露，早在两天前，国民党中宣部就明令各报不许登载上海人民代表来京的消息。这一切都确凿地证明，下关惨案是国民党当局蓄谋已久、一手策划的。为此，民盟政协代表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

马叙伦等被殴打的消息传出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表示亲切慰问。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①当他看到受伤代表都躺在医院的长凳和临时担架上时，又立即亲自和院方交涉。邓颖超得知受伤代表还未吃饭，便立即派人到梅园新邨中共代表团驻地取来牛奶饼干，使受伤代表深为感动。斗争的实践教育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血的教训使他们提高了觉悟，思想上产生了飞跃，对国共双方所代表的利益有了初步的认识。马叙伦在医院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还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炮，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此后，这些民主人士抛弃“国共纠纷的公共仲裁人”的第三者立场，更坚定地站到人民革命，积极参加反蒋反美斗争。

下关惨案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很快形成了一

^①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241

股声援上海人民代表，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罪行的浪潮。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就在国、共、美三方（即军调三人小组）会议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和严惩肇事犯等6项要求。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还给马叙伦等8位上海人民团体的代表写了慰问信。不久，毛泽东、朱德从延安打电报给马叙伦等，电报说：“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借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①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南京惨案》的社论。陕甘宁边区、晋绥解放区和张家口等地各群众团体纷纷举行集合，一致声讨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电慰和声援马叙伦等受伤代表。6月25日，民盟政协代表致函国民党代表，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下关惨案的肇事者，“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证人民之各项自由”。^②上海人民请愿团回到上海后，马叙伦、雷洁琼等先后写了《记6·23下关事件》、《下关被殴》等文，分别在《民主》、《文周报》和《汇报》上发表，以其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二）动员一切力量制止内战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反对、制止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民促和民联等民主党派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做了许多工作。民促和民联成员主要是对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部属和朋友进行劝说和策动。1946年5月，李济深和冯玉祥一道从重庆乘船回南京途中，李济深劝说去看望他的国民党军长覃异之不要参加内战。他们回到南京后，又派人策动自己的老部下反对内战。这一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和帮助。为了解决他们的活动经费，董必武给了李济深700万元钱。李济深给五葆真500万元，给余心清100万元，以便

^① 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71.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80~181.

他们到北方去进行争取国民党军队的活动。还派人到徐州一带策动张岗峰起义，同去的有董必武所派的人。冯玉祥曾把旧部属吴化文、张克侠带去见李济深，要吴、张以后一切行动听李济深的指挥，李济深当即要他们以后不要打中共，遇到中共可把军队撤到别的地方去，并和农工民主党章伯钧等人一道帮助吴化文与人民解放军陈毅司令员建立了秘密联系。后来，吴化文终于在1948年秋率部两万多人在济南举行战场起义。李济深、冯玉祥还写信或当面劝阻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政协决议。

国民党对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要求置若罔闻，仍旧一意孤行，在他们认为内战准备就绪后，于1946年6月26日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继而发动了对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马歇尔也宣告他“调停”失败。

为了制止这场大规模内战的进一步发展，在香港的民促领导人、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蔡廷锴等联合各方面民主人士98人于6月28日，在港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国会及国内新闻界，呼吁全面永久停战，实行政协决议，要求美国停止一切助长中国内战的措施。6月30日，在民促的发动下，港九各界又召开“促进祖国和平运动大会”，何香凝、彭泽民等20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又给蒋介石、马歇尔发了电文，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民联重庆分会警告国民党统治集团：如果一意孤行，继续扩大内战，则必是自绝于人民。

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挺身而出，发表了对时局的重要主张，要求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呼吁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她指出，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混乱、饥饿与破坏”，“城市和农民被隔绝”，^①必须立即扑灭内战的火焰，并断言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国民党决

^① 解放日报，1946年8月2日。

不能在内战中取胜。宋庆龄的《声明》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立即得到了中共、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三）不畏强暴、不屈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有些政治投机者、政客被国民党的表面强大所吓倒，投向了国民党反动阵营；有些中间派的朋友对人民力量表示怀疑，对美蒋反动派表示恐惧；革命队伍中有的人也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不敢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战争。在这关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为了坚定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和阐明共产党的根本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1946年8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讲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为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针，并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粉碎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后，为了挽救军事危机，于1947年1月，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共产党提出恢复“和平谈判”，要求实现“就地停火”，企图休整兵力，再作进攻。为了揭穿国民党的新骗局，中国共产党提出恢复谈判必须实现下列两项要求：第一，废除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制定的伪宪法；第二，国民党军队退出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后所侵占的一切土地。国民党的“和平”新骗局被揭穿后，于1947年2月，强迫军调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撤回延安。接着又限期于3月5日前迫使中共留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全部撤退。随即宣布，以后如再发现中共党员，即作为匪徒间谍治罪。国民党完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从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采取军事斗争形式，辅之于政治斗争形式。

对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中共中央负责人于3月3日发表讲

话，严正指出国民党“最后地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已“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①民盟也于3月8日发表宣言，对国共两党正式宣告和平谈判破裂表示痛心。他们表示从民族和人民利益出发，愿意继续调解国共关系，并宣告不怕当局迫害：“吾舌尚存，必发为言论，吾笔未秃，必写为文章。吾人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定力，实本吾人有‘苟利于国死生以之’之决心，如定欲横加诬陷，甚而迫害之，则眼前之刀锯斧钺，决不苟避幸免。”^②

国民党的卑劣行径唤醒了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民促会主席李济深，看到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独裁政策无法改变，便决心去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派的力量公开反蒋。为了筹措活动经费，他将南京的一栋住房租了出去，获得1亿元，于46年底到达上海，秘密会见宋庆龄，告知了他准备去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力量公开反蒋的打算。宋庆龄表示完全赞成，要他多发挥作用。同时，李济深还派人找到了在上海的董必武，告知他“到香港组织反蒋活动”计划，得到了董必武的赞同与支持，并要他尽可能快些离沪。1947年2月，李济深秘密到达香港，与原已在香港进行反蒋活动的民促领导人何香凝、蔡廷锴等会合。3月，李济深在香港发表了对时局意见，坚决反对内战，强烈谴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指出，中国到了今天，无论就整个国家民族来说，或就执政的国民党来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可收拾，必然会走上总崩溃的道路。揭露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为奴役人民，蒋介石已成为反动派之领袖。并提出挽救时局的7点意见。李济深的声明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各民主党派都拥护李济深的主张，纷纷发表谈话

① 解放日报·1947年3月3日。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308

和声明谴责国民党，要求国民党采纳李济深的意见。

李济深的主张触及了国民党的痛处。同年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开除了李济深的党籍。国民党的这一行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舆论大哗。5月21日，何香凝指责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救国救民的意愿，表示不愿为他们分负祸国殃民的责任，并说“做这样糟糕的国民党党员，又有何光荣”。她认为，李济深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对于李先生丝毫无损”，适足以证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过是周厉王、秦始皇这一流人物。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不仅没有吓倒国民党民主派，反而促使了国民党民主派与国民党反动派分道扬镳。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了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境地。

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斗争中，有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把各界人民的反内战运动镇压下去，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制造白色恐怖，民盟云南省支部不畏强暴，仍连续3天招待各界人士，坚决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并和云南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民盟中委、云南支部领导人李公朴大声疾呼：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遭到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杀害。李公朴被害后，民盟中委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为李公朴组织治丧活动。7月15日，他在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上拍案而起，当众愤怒地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法西斯暴行，强调指出：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表示了自己的坚定决心：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回来。当天，闻一多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牺牲精神，表现了他们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气概，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成员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毛泽东对李、闻的光荣牺牲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

可倒下去，不愿屈服”，“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①

李、闻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们纷纷发表宣言、唁电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声援、同情和支持民主战士。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分别给李公朴、闻一多的家属发来唁电，为李、闻遇害表示深切哀悼。表彰李、闻“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歌可佩”。并望全国人民继承先烈的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②中共中央政协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李维汉致函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陈立夫、张群及蒋介石，抗议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抗议书说，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因热心奔走和平民主运动，竟先后在昆明被暗杀致死。政府一面大举进攻解放区，准备造成全面内战；另一面，指使特务机关在大后方暗杀和平民主领袖，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犹不敢肆意为之。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全国：（1）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拿凶手，交法院问罪。（2）先葬死者，通令全国追悼。（3）责成各地政府及军警机关，负责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4）重申四项诺言，彻底予以实施。（5）彻查各地发生之惨案，惩办祸首。（6）取消一切特务机关。（7）释放一切政治犯。7月17日，周恩来晨访民主同盟留京代表梁漱溟，对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表示深为悲愤，并表示慰问。接着，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李、闻惨案“完全是计划的，而且是肆无忌惮的政治暗杀”，采用“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如果国民党当局对此仍不采取紧急处置，改弦更张，取消特务，则一切政治协商都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495—1496

^② 解放日报，1946年7月15日、7月19日。

徒然无望”。^①周恩来还亲自写了《悼李公朴、闻一多词》，由邓颖超代表他在上海各界追悼会上宣读。

民主同盟对国民党当局暗杀李、闻的卑鄙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指出这“是反民主、反和平，有计划之阴谋”。^②民盟中央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我们民盟对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恐惧与退缩。民盟政协代表，要求国民党政府惩办凶犯和主使者，联合调查惨案真相，遭到国民党拒绝。8月3日，民盟派中央常委梁漱溟、中央委员周新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昆明调查李、闻被杀真相。尽管调查工作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阻挠和破坏，但在民盟成员和进步学生的协助下，仍搜集到了大量罪证。9月30日，民盟中央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李闻案调查报告书》，用大量事实揭发国民党政府杀害李、闻的罪恶。

各民主党派一致愤怒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罪行，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向李、闻的家属发出唁电，表示慰问。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李闻惨案”的目的，是想恐吓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迫使他们停止反内战活动，以便反动派顺利推行内战独裁政策。但适得其反，李闻事件不仅没有制止各民主党派反内战的呼声与斗争，反而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从反面教育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坚定了他们斗争的决心，更密切了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民进领导人马叙伦毫不畏惧地表示：“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我也预备送还他一颗子弹。”^③10月31日，九三学社鉴于当时时局严重，又发表了6点意见，强调恢复和平谈判，永远停止内战等。由于九三学社的大多数成员是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有较高的威望，《宣言》发表后，国民党当局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237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98

③ 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71

极感震惊。陈立夫、朱家骅先后亲笔写信劝说在《宣言》上签名的著名林学家梁希，希望他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继而又派人许以高官厚禄，但均遭梁希拒绝。陈、朱两人恼羞成怒，派特务荷枪实弹相威胁，梁希大义凛然地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的后面，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①周恩来得悉此事后，指示地下党的同志保护梁希。

在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斗争中，民盟于1947年1月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目前应采取的政治主张及行动的决议案》。这次会议表明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成员，经过一年来的实际教育，认识到国民党应负内战责任，美国对华政策是错误的，共产党是被迫进行自卫的。这是民盟在政治上的重要进步。在当时，其他民主党派与民盟一样，在事实面前逐渐认清了美蒋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同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开始对中共和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给予同情和支持，并开始改变第三者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配合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二、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抵制“伪国大”

（一）在中共帮助下，民主党派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利令智昏地自以为“共军已崩溃”，于侵占张家口的当天下午，下令在南京召开所谓制宪的“国民大会”。按照政协决议规定，真正的国民大会应当在内战完全停止、政协各项决议已付诸实施，人民自由权利已获得保障之后，由改组的各党派共同组成的人民联合政府召集。国民党的独裁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与各民主党的抵制。但国民党仍决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

在“国民大会”召开前，蒋介石为使其伪国大贴上合法的标

^①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371

签，一面用高官厚禄拉拢收买中间党派，以孤立共产党；一面故作姿态地策动民主党派出来调解。在这种情况下，民盟等民主党派，是接受国民党拉拢参加伪国大？还是维护政协决议与共产党站在一边反对伪国大？这是当时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民主党派在这个严峻的考验面前，也有所斗争，有些人一度犯过错误，但在中共的及时批评和耐心教育下最终改正了错误。而大多数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坚持了维护政协决议的立场，采取了反对召开伪国大和拒绝参加伪国大的正确态度。

早在1946年9月30日，民盟政协代表就致电蒋介石，要求国民党不要单独召开国民大会，表示将不参加。蒋介石采用欺骗与拉拢手法后，斗争呈现出复杂的情况。10月上旬，民盟和青年党的代表与司徒雷登商议后前往上海，目的是劝请周恩来返回南京继续会谈参加“伪国大”事宜。鉴于当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国民党为扩大内战作准备的事件，周恩来等决定暂不去南京，并指出了这是蒋介石的和谈骗局。但当时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幻想国民党能够停战和执行政协决议。中共为了使第三方面得到教育，懂得谈判不会有结果，就同意他们调解。10月2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李维汉等与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由沪抵京，准备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但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竟于当天下午飞往台湾，致使谈判无法进行。

中共方面提议商谈形式可以不拘，但必须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办事。第三方面人士亦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度，连日磋商，力图在国共双方提出的和平条件之间进行调和。10月28日，他们竟违背10月25日民盟与中共的协定（即第三方面如有重要主张和行动要事先同中共协商并征求意见），而向国共双方提出了一个和谈折衷方案。这个折衷方案的内容是：（1）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处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处理，其驻地分配，由

三人小组协议定；(2) 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3) 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法修正案。不仅如此，第三方面还在这个方案中加上第一第二两条的详细规定，即第一条就规定共产党在东北的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地；第二条又规定蒋介石政府得派县长同警察接收共产党所在的沿铁路线的各县地方行政工作。这样，国民党攻打、占领张家口成为合法的了。蒋介石政权从共产党手中抢夺地盘和政权也是合法的了。这个方案完全有利于蒋介石，可以说是蒋介石和平条件的翻版。因此这个方案及其炮制者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现在国民党已经全面向解放区进攻，要用武力消灭我们，你们还想在我们背后捅一刀子！国民党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想在我们身上踏一脚！你们那个方案，我们是绝不能接受的。”^①“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②周恩来还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由于周恩来的及时批评与纠正，第三方面人士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及时地收回了那个方案，没有铸成损害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更大错误。

11月8日，蒋介石再次单方面宣布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开会。在中共的争取和教育下，民盟坚定了抵制伪国大的立场，经慎重研究讨论后，郑重决议拒绝参加伪国大。当国民党将伪国大召开日期延后3天时，民盟不为所动，又于11月14日发表《紧急通告》，重申前言，要求民盟各级组织坚决贯彻民盟中央11日所作的政治决定。当日晚，民盟主席张澜亲自从重庆打长途电

① 光明日报，1978年3月2日。

② 纵横，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5期第14页

话给留京政协代表团，再三强调说：“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①民联重庆分会、民建重庆分会、九三学社重庆分社等 21 个党派团体，于 11 月 10 日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的分裂行动。由于中共、民盟和各民主党派的拒绝参加，许多无党派人士和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也用各种方式拒绝参加“国民大会”。

1946 年 11 月 15 日，伪国大在南京开幕。其代表大多数系 10 年前由国民党用指派、圈定、贿选、舞弊等方法产生出来，在广大人民中毫无威信、毫无民意可言。国民党参加人数，公然侵占了政协协议的其他党派代表 410 人的名额，其中有原定解放区代表 200 人中的 140 人。蒋介石所谓“空出名额等待中共参加”的谎言不攻自破。参加伪国大的还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接受国民党拉拢的无党派政客。这些人被当时进步舆论视为“落水”或“堕入妓院的火坑”。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痛斥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表示坚决不承认伪国大和所谓宪章。1946 年 11 月 16 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他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召开的，它隔断了和平谈判的道路，并企图使独裁、内战、分裂卖国合法化。所以中共坚决反对，决不承认。表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②此后，中共中央一再对“调解”的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中央报》记者强调两党重开谈判的前提是解散伪国大。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46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652

在重庆、昆明、上海、香港等地，民主党派几十个地方组织，也纷纷发表声明、谈话和抗议书，指斥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国大”，妄图用假民主来掩盖其法西斯独裁，推行内战政策的罪行。海外华侨团体也纷纷向祖国发来通电，表明自己的态度，严斥蒋介石。这说明，蒋介石的这场假民主丑剧，不但在国内不得人心，而且在国外也受到了舆论的谴责。甚至连当时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也不得不说，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不予中国人民以民主，而使国家陷于内战的混乱之中。

伪国大的中心内容是制定宪法。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操纵下，伪国大通过了一部“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的维护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伪宪法。伪宪法一出笼，就遭到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否定。伪国大闭幕后，中共严正声明，蒋记国大及其制定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无效。民建、民促、九三学社等11个民主党派与民主团体，在上海《文汇报》联名发表对伪宪法的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定的所谓“民主宪法”，企图借以欺骗国内外不明真相的人士，并向美国继续骗取军事的、财政的以及其他种种的援助，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继续扩大并延长战争，把人民送上死路，把国家送上绝道。

由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揭露与斗争，致使伪国大和伪宪法名誉扫地，失去了欺骗人民的作用。伪国大闭幕后不久，上海和蒋管区就爆发了人民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二）批判所谓“改组伪政府”，拒绝参加伪政府

国民党在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后，接着宣布“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此，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3月9日，民促主席李济深在香港指出，目前政府在高唱改组，但如果只能吸收青年、民社两党，及一些出席国大的所谓社会贤达来参加，仍将民盟、中共及其他努力和乎民主之人士，摒诸门外，依照换汤

不换药，不能一新耳目，实无补于和平统一，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1947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改组。国民党政学系首领张群，代替宋子文当了行政院长。青年党、民社党的一些头目，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和几个部的部长。由此，蒋介石宣称它是“多党政府”“自由主义政府”。美国政府也公然称其“加强了进步或自由的色彩”。但是，蒋介石换汤不换药的戏法欺骗不了广大人民。4月22日，新华社在题为《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的社论中尖锐指出：蒋介石这一“改组政府”的把戏，不过是继承袁世凯旧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其媚外、残民、打风战、走死路等特点，将无一而不像。蒋介石统治集团是同时处在政治、军事、经济三大危机之中，为了挽救危机，他们认为需要借外债与继续打内战。社论最后指出，“旧筹安会出现之后，袁世凯不久就垮了台；新筹安会出现之后，蒋介石的命运决不会好过袁世凯，也许比他更坏些”。^①4月25日，民主同盟就改组政府等问题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国民党改组的政府，没有结束国民党的党治，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政府。民促、农工民主党、救国会、民建等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揭露国民党搞假民主的欺骗行径。事实表明，国民党重新改组的政府丝毫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它得到的却是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的极端不满和强烈反抗。

从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到改组政府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军事斗争阶段。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除少数人外都经受了这场严重的政治考验。因为此时蒋介石当政者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主要是采用引诱和拉拢的手段；在国统区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斗争也主要是政治欺骗。诚然，这种斗争对中共的军事斗争是有一定影响的。人们事后把这场考验称作过好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人民出版社，1979.297

战争关，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当时，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仍处于劣势的形势下，民盟等各民主党派能够不顾国民党的利诱、威胁，甚至逮捕、残杀，而和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边，表明了他们献身民主事业的革命精神和与中共风雨同舟的高尚品德，因此他们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钦佩和尊敬。经历了这场斗争风暴后，各民主党派更坚定地与中共站在一起，携手与国民党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

三、第二条战线上的合作

(一) 反对美帝侵华和美蒋反动派的暴政

第二条战线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的反对蒋介石政府进行反革命内战，实行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它以学生运动为先锋，包括工人运动、市民运动等。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①“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②

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了第二条战线，而且通过各级党组织，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发展壮大。各民主党派积极支持和参加了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并为第二条战线的发展、壮大发挥了作用。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为了取得美帝国主义大量战争物资和贷款，变本加厉地出卖国家主权，使中国实际上变成了美国独占的殖民地。蒋介石政府与美国先后订立了许多公开的和秘密的卖国条约和协定。其中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224—1225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225

通商航海条约》则是这些卖国条约和协定最集中的表现。它加强了蒋介石政府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使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勾结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财政、经济。它造成的后果是：全国范围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

中共中央及时地分析了国内形势，不失时机地指出：在国统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有利于群众斗争的发展。“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①在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城市和乡村开展了反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斗争和军事斗争。1946年11月底，上海摊贩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当局“取缔摊贩”命令的斗争。12月，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罢课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接着，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学生起来反对美军暴行，南京学生到美国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这样，抗暴运动到1947年2月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革命风暴，并迅速地得到城市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成为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标志。各民主党派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

为了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和反对美军帮助国民党军队打内战，从1945年12月起，民盟、民促、农工民主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就以各种方式谴责和抗议美国援助、支持蒋介石打内战。1946年10月6日，民盟中央代表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毫不含糊地表示：“民盟坚决反对美军驻华，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驻有外国军队。尤其是在内战中的中国，美军的驻华显然助长了中国的内战。”“美军如不撤退，民盟敢于对美国说：中国的内战，美国要负责任。”^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208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240

1946年12月24日，美军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的暴行被揭发后，12月31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致董必武、吴玉章等人的电报指示中指出，发动国统区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大城市举行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游行示威，或请愿与组织后援会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进而要求美军全部撤出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等。周恩来还指出：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营。

九三学社许德珩、袁翰青等人立即发动北大教授50多人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美军暴行提出抗议，并将函件公布在北平报纸上。12月底，重庆市民盟支部、重庆市民建国会和九三学社分社等16个党派团体和上海11个民主团体，发表宣言，各民主党派在海外的组织和华侨政党致公党也纷纷反对美军暴行。他们都在声明中揭露美国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野心，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谴责国民党政府引狼入室，为虎作伥。

面对国统区人民反对蒋介石政权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①并发出指示，要求因势利导地在国统区组织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②并于1947年4月29日决定成立城市工作部，周恩来任部长。在国统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生界又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211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喊出了“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这一爱国民主运动立即发展到南京、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城市。5月20日，京、沪、苏、杭16所学校学生6千余人，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禁令，在南京联合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提出反对内战，增加伙食费和教育经费的要求，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五·二〇惨案”。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工人、教育等各界的支援和参加，使反美反蒋斗争迅速发展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五·二〇”运动标志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1947年，仅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投身到反美反蒋的罢工和示威的群众就达120万人，震撼着美蒋反动派的统治。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这一运动中密切配合，积极领导、参加和推动这一运动向前发展。5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罗迈、上海局、香港分局及朱德、刘少奇，指出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有时前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上述京沪苏杭学生的联合大游行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南京中央大学。而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青社”，和民盟在学生中的秘密支部相互合作，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五·二〇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要使此次学运的政治经济斗争口号成为有机的联系”，“不要脱离中间分子，要依其觉悟程度，提出各种部分辅助的口号，以推动其向总的斗争口号前进。”^①民盟总部及各地方组织积极声援爱国学生的斗争。南京民盟总部以慰问金名义筹款支持南京中央大学学生的罢课斗争，并派人赴各校

^① 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674

联络，支持中大学生。沈钧儒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民建领导人黄炎培、农工党负责人章伯钧、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轮流到中央大学等校讲演赞扬学生运动。民进与民建于5月20日发表了《对和平运动的意见》，揭穿伪和平运动的实质，抨击国民党的暴行。5月22日，九三学社北平分社联合北大教授俞平伯、沈从文、闻家驷等31人发表《北京大学教授宣言》，指出：青年学生所呐喊的反内战、反饥饿，正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我们应该同情。并正告国民党当局：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实，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推诿与压制则结果适得其反。民促也捐款200万元供给学生作活动经费和派员慰问受伤学生。

各民主党派除参加、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外，还组织成员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反美反蒋斗争。1947年2月22日，就国民党当局搜捕北平教育界人士的事件，九三学社组织了13名教授发表了《保障人权宣言》，对政府搜捕教育界人士事件提出抗议，要求从速释放被捕人员，保障人权。民促也在3月2日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大规模搜捕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及大学生。国民党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被捕人士陆续释放。民促还于5月29日，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名义，发表了时局宣言，号召群众把亲人从内战战场上叫回来，并抗拒国民党的征兵，以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学生的反内战斗争。

各民主党的上述活动，对于促进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发展，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在中共的帮助和影响下，民主党派自觉靠拢共产党

自抗战胜利以来，中共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抱以真诚相待，爱护帮助的态度，无论是在敌人拉拢利诱还是镇压迫害他们时，中共都是如此。当国民党采用欺骗手段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时，中共耐心地说服、教育、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摆脱国民党的拉拢利诱；当他们遭到暴力镇压与迫害时，中共挺身而出，站到斗争的最前列，想方设法地保护他们，使他们避免

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当他们碰到困难时，中共与他们站在一起，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使他们顺利地度过难关。这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了。

1946年7月，内战爆发不久，民促负责人林汉达遭到国民党密令通缉，中共地下组织便安排他秘密由上海转赴东北解放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陶行知遭到国民党迫害去世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并安慰家属。当晚，周致电中共中央说：“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已告上海潘汉年及伍云甫，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①同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吴玉章、张友渔等电复中共中央和南京周恩来、董必武，报告工作情况说，已尽量精减省委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送回延安，非到不得已时，省委的牌子似无自动摘下之必要，因为这将影响到民盟及广大中间人士的存在与活动。1947年3月，国共谈判完全破裂，中共中央考虑到形势将进一步恶化，为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计，致电董必武等，指示已取得社会地位的人士，如郭沫若、马叙伦等，只有暂时韬晦，要董必武等作好这一工作。3月4日，中共在撤退前将南京、上海、重庆的房产、交通工具及其他财物，统统交与民盟代为管理，并通过法律手续公开登报声明。民盟中央委员叶笃义回忆到：“名为代管，其实是无偿赠送。民盟当时经济上是很穷的，中共这一举动，不但在物质上给民盟以很大帮助，同时在国内外影响上大大提高了民盟的威望。”^②这说明中共在领导全国人民对敌斗争中，时时处处是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着想的。

随着蒋介石独裁面目的日益暴露，不少民主党派认识到中共是他们的真正朋友，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例如，1947年2月，农工民主党在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提出：过去对农工阶级工作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238

^②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110

做得不够，在行动上对于“中共”和“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没有明确的态度及在组织上存在问题。为此决定该党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在蒋介石加强其独裁统治时，致公党在中共的帮助下，决定重新整顿党务，加入以中共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努力与筹备，致公党于1947年5月1日在香港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致公党的工作，一致通过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抨击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呼吁重新召开政协会议，制定新宪法，选举民主政府。这次大会是致公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宣布从此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此奋斗到底。这说明，在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新阶段中，致公党与中共的密切合作。

1947年2月28日，台北人民为抗议国民党官员无理开枪打死台胞的行径，进行了罢市和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愤怒的群众夺取了电台，得到了全省人民的响应，国民党大部分地区的机关被推翻，建立了革命政权。“二·二八”起义是自发性的民变，为此《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由新华社广播，支持了台湾人民的斗争，并为斗争指明了方向。

“二·二八”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后，许多台籍人士感到，要继续坚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谋求台湾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必须组织一个能团结台湾各界人士的政治团体。参加“二·二八”起义的革命者于1947年11月12日正式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于12月1日在香港《华商报》公布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成立文告》等文件，阐述了要求实行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工商业等政治、经济主张。台盟的成立使岛内外台胞有了一个公开的政治团体，这对于团结广大台胞共同反对美蒋统治，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它得到了台湾团体和许多台籍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也得到了中共的指导和帮助。

综上所述，中共一方面正确地领导了国统区人民的反蒋爱国

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团结、争取了中间人士，帮助各民主党派进步，使各民主党派把自己的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开始自觉地靠拢共产党。从此，爱国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形成了反对美蒋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三）民主党派不顾国民党的迫害、坚持斗争

1947年5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英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继而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美蒋反动派为了挽救其衰败的局面，更加穷凶极恶地迫害和镇压国统区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爱国人士。

随着蒋军在战场上的局势的不利发展，国民党决心消灭共产党，并借“戡乱”之名，取缔人民民主运动，加强法西斯统治。1947年6月25日，国民党以其最高法院的名义发布“平字1906号训令”，通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7月4日，蒋介石亲自提出《励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表示国民党要“动员全国力量”，“决心戡乱”，“全力铲除共产党”。7月9日，又正式决定，撤消政治协商会议及其秘书处组织，同时取消共产党的国大代表、国府委员的保留名额，开除国民参政会中的共产党参政员。接着又陆续颁布《后方共产党处置方法》、《戒严法》等反动法令。并在全国各地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为了配合“戡乱”，国民党还大肆迫害爱国民主人士。蒋介石于9月27日在南京召开秘密会议，布置了对民主人士的大逮捕。北平、上海、广州、杭州、西安以及东北各地，大批爱国人士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和屠杀。国民党还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汉口等地成立特种刑事法庭，镇压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

由于民盟在各民主党派中力量最强、影响最大，民盟的许多领导人同时又是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的负责人。民盟在过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与中共的关系日益亲密，因而国民党当局认为：要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不仅要消灭共产党，还要对民

盟开刀，只要将民盟置于死地，其他的民主党派就容易对付了。为此，他们精心策划了迫害民盟的阴谋。从1947年4月起，国民党舆论工具就大造反动舆论，诬蔑民盟等是“奸盟”，是中共的“尾巴”，“新的暴乱工具”等等，叫嚣要否认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还大肆逮捕成都、重庆等地的民盟中委和盟员数百人。5月3日，国民党公布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所谓的观察家谈话，诬蔑民盟、民建、民促、民联、农工民主党等均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胡说“民盟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音旨”。7月初，在国民党公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后，又训令国民党各级组织，对各民主党派的上层分子，采取“暂时容忍敷衍”的方针，对中下层分子则不要客气，只要有反对国民党的活动，“一律格杀勿论”。10月7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在招待会上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同时，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枪杀了著名的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10月21日，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竟发出通告：限令共产党人及其“关系人”按期登记，逾期则“依法逮捕”。10月23日，国民党派大批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10月28日，国民党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5月学潮及上海工潮”，“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并“企图颠覆政府”等罪状，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叫嚷今后民盟及其成员的活动，一律按《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惩处”。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暴力压迫，民盟曾进行过抗议和斗争。国民党公开宣布取缔民盟后，民盟领导人在上海举行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决定派黄炎培等人赴南京国民党政府交涉，但遭到了拒绝。此前，他们曾向美国大使馆求援，而司徒雷登反而劝民盟“光荣解散”。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发觉，他们曾寄予厚望的民主同盟其“共产党倾向继续招人怀疑，很少希望它能起自由行动的核心作用”，所以支持对民盟的取缔。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民

盟在上海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民盟宣布自动解散。

民盟被迫解散后，绝大多数民盟地方组织和盟员纷纷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并郑重声明，继续开展民盟活动，从事反对美蒋的斗争。民盟总部负责人沈钧儒、史良、周新民等反对个别领导人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不同意解散民盟总部。民盟南方支部庄重声明，国民党解散民盟的命令是非法的，表示要更加加强团结，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

就在民盟处于最困难最危险的紧急时刻，民盟的挚友中共向它伸出了诚恳支持、热情帮助的双手。11月6日，延安中共中央以新华社的名义发表了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痛斥国民党迫害和解散民盟的罪行。高度评价了民盟的作用：“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主同盟的光荣。”^①《时评》同时指出：民盟应该从被解散的事实中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②中共不仅在关键时刻声援和支持了民盟，而且中肯地帮助、教育了民盟，为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指明了一条现实可行的光明的道路。不久，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帮助了民盟领导人沈钧儒、民促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等先后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以免遭到国民党的暗害。

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解散民盟的暴行，表示今后更要努力为创建新中国而斗争。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致函给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张群，怒斥国民党镇压人民的罪行，无所畏惧

①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人民出版社，1979.334、336

地表示：“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捕杀不辞，驱胁无畏”。^①民促主席李济深，就国民党解散民盟事件在香港对《华商报》发表谈话，指责蒋政府“彻头彻尾暴露其独裁专政的面目”，驳斥了蒋政府所说的“民主同盟勾结共产党”的谬论。他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共产党主张民主和平，民主同盟也主张和平，这叫做勾结吗？

民盟被迫解散后，各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其领导人一部分转入地下，采取分组活动等方式坚持斗争，一部分去香港和解放区坚持公开斗争，从此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关系更为密切，斗争目标更为一致。

民盟总部的被迫解散，在民盟历史上是一大挫折，同时也宣告了第三条道路的破产。抗战胜利后，一度出现了和平民主新形势，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更明朗化、系统化了。这种所谓“中间路线”，实质就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是介于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之间的一种国家主张，不少民主党派向往、追求过它。邓演达曾主张“平民政权”，民盟提出“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民建自称“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的现代国家，都具有这种性质。而且他们追求的“中国型的民主”是既要以英美的民主制为样板，而又要力图避免它们的某些弊病。在1946年至1947年，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呈现某种均势，战争胜负未分的态势下，他们作出了国共两党“谁也消灭不了谁”的估计，走“中间路线”的幻想和活动达到了顶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主张直接地反对了国民党的内战、分裂政策和一党专政，具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有些人同时又存在着对美、蒋抱有幻想、害怕革命战

^① 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78

争，希望共产党牺牲一些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换取国民党“开放政权”的消极的一面。应该说从抗战胜利后到民盟总部被解散前，民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中共实行了政治合作，但亦有少数人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保持“超然独立”的第三者立场。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他们以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要国共两党放下武器，交出军队，只是在他们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行动遭到镇压时，才认识到蒋介石的独裁面目，对共产党的人民武装寄予同情，给予支持。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后，民盟内有的人仍然坚持资产阶级中间路线。他们重申：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我们不能参加。在一党国大闭幕后产生的一党政府，我们不能参加。同样的如果时局演变，中共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也组织联合政府，我们一样不能参加。必须如此，我们方可以继续努力于团结和平民主的运动。虽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思想，但也切实地反映了中间路线的立场。第二条道路在一段时间里在民主党派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全国各阶层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说中间路线在抗战胜利后有其积极进步的作用，那么当国共合作的局面完全破裂，国民党决心把内战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时候，特别是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之后，它的积极的一面就消失了，在客观上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手，人民革命的障碍。由于中共始终对他们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工作；也由于人民战争的节节胜利；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迫害和镇压，才使他们认识到“中间道路”行不通。严酷的斗争现实不仅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这个幻想，也迫使他们作出抉择：在国共两党严峻的斗争中，他们要么靠近共产党，要么靠近国民党，二者必居其一，不能有其它道路。于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接受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走上了革命道路，从而巩固和扩大了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总而言之，从国民党发动内战到民盟的被迫解散，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合作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在中共的团结、教育、

帮助下，民主党派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个阶段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特点表现如下：

第一，民主党派在同国民党斗争过程中，与自己内部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克服自身的弱点，坚定地与共产党合作。

由于各民主党派一开始就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特点的党派组织。在这样的阶级联盟内，其组织成份“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①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政治要求，是不完全一致的。这样，各民主党派在前进的过程中不能不同自身内部的某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并且逐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这种斗争在这个阶段反映得十分明显，克服的错误倾向主要是某些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鼓吹的“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另一错误倾向是伪国大召开时，极少数上层代表人物曾背着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参加伪国大的而极不利于共产党的妥协方案，以及民盟遭到国民党迫害时，自动宣布解散，这都反映了民主党派中一部分人对国民党的动摇、妥协。当然，他们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在共产党的耐心教育和严肃批评下，在其组织内部左翼爱国分子的积极斗争下，纠正了这些错误，收回了妥协方案，民盟将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员清除出盟，纯洁了民主党派组织，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信念。

第二，民主党派由联共到拥共，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加深与密切。

民盟被迫解散，标志着第三大党运动的失败，第三条道路破产，也从反面教育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势力同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284、285

反革命势力展开最后大决战时，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界限已经异常明朗化，任何阶级、阶层都没有丝毫的独立余地，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民主党派在这种形势下，“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的道路”。^①严酷的斗争现实告诉他们，民主党派“和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之间，实已到了无法并存的境地了”，^②在这样的情况下，靠和平合法的斗争去争取民主，必然要遭到失败，因此他们醒悟到，自己的立场“该是革命的立场”。失败的教训也使他们认识到：“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并表示：“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③同时民主党派还认识到，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与共产党的革命联合起来，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这种政治上的进步使得民主党派开始了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也由联共到拥共，这就为民主党派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一边倒”，公开与共产党密切合作，最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基础。这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争取民主政治的民主党派和领导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是经过严峻考验的，是历史的选择。

这个时期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宝贵经验。这就是如周恩来所说的，对中间分子，平时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决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从政协会议开始，共产党采取正确的论战政策，在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284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387

③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394—395

实际斗争中，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他们正确的主张和活动予以全面的支持与帮助，充分发挥其革命性；对其政治上的动摇及其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进行严肃坦率的批评教育和引导，不断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吸引他们靠近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增加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与依靠。即使像青年党、民社党这样的右翼势力，共产党起初对他们也不采取排斥的态度，仍把他们作为第三方面的一部分与之交往。一方面对其亲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心中有数，一方面又采取积极争取的方针，直到他们最后宣布参加伪国大，公开暴露其投靠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为止。共产党的这种高度原则性的政策和斗争方法不仅壮大了国统区爱国民主阵线，也加强、巩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第三节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携手共建新中国

一、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号召

（一）民盟三中全会召开，民主力量重新集合

蒋介石反动集团自发动内战到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时，已陷入严重的军事政治危机之中。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及时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就必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随后，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12月陕北米脂县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

合政府。”^①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好了准备。

革命形势的发展，“中间路线”的破产，迫使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重新考虑中国的出路和前途。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们开始了新的组合。

1947年12月，民联、民促成员和国民党其他民主派代表，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被推选为主席，冯玉祥被推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民革主要是由国民党内部长期坚持爱国、民主和反蒋斗争，并在政界、军界有影响的人组成。它的成立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会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全面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种种罪行，指出他早已背判了国民革命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民革宣布自己的目标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助长中国内战的政策；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耕者有其田”；成立联合政府。民革成立后，民促和民联两个组织，仍继续存在。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与反动派彻底决裂，统一和扩大了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使国民党反动势力更加陷于孤立。这是当时国内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共产党的重视、欢迎与指导。在民革讨论推举谁担当革命委员会主席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非宋庆龄莫属，并写信给宋庆龄，请她俯允担任主席。但宋庆龄经过慎密的考虑，认为以她特殊的身份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比之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如果参加分开反蒋的革命组织，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为此她征求了中共的意见，中共表示完全尊重她的意见，并由中共在香港组织的负责人章汉夫带密信给宋庆龄的俞志英转达了这一意见。民革成立后，中共中央发言人于1948年3月6日发表评论，明确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256

表示：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赞成其在宣言和行动纲领中表示的反对美蒋和建立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

民盟被迫解散后，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等出走到香港进行斗争。在形势的推动和广大盟员的热切期望下，沈钧儒、周新民等与原来在港的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等着手筹备召开民盟三中全会。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会议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三中全会宣言》等决议文件。民盟三中全会严厉申斥蒋介石的恶劣行径，严正声明否认南京反动政府关于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反动决定，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于去年11月5日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与声明。”庄严宣布民盟要“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①全会重新确立了民盟的政治路线，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严肃地批判了中间路线，高度赞扬了中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作的英勇斗争，宣布民盟要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武装”，^②“与中共携手合作”。^③全会还重新确立了民盟的组织路线，重建了民盟总部。

民盟三中全会的决议得到了民盟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的拥护。民盟英国支部认为：“三中全会的决策是本盟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提出民盟应“以实际行动参加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南京民盟支部致电民盟总部“表示衷心拥护”，四川民盟支部则派专人赴港向总部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中共欣喜地看到了民盟总部

①②③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363、364、373

的重建，对民盟政治上的进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赞扬他们提出的反对美蒋的新纲领。3月6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评论，对民盟三中全会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欢迎民盟和中共一道为着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前进。评论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统一战线必须在中共的领导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胜利的。”^①

民盟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是民盟历史上政治的转折点。会议举行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即：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和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因而民盟三中全会具有不寻常的重要意义。全会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中间路线，宣布彻底与美蒋决裂。从此，民盟以崭新的姿态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斗争。三中全会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②

（二）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1948年5月，已经是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决战前夕。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全面覆灭已为期不远。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为了进一步孤立反动集团，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以争取和迎接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在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发布的口号里，提出“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

^① 东北日报1948年3月8日。

^②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90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①向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的号召。中共的这一号召，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要求，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就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大步骤。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5月1日致函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并派专人去港送达。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③提议先由民革、民盟、中共先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对此征求李济深、沈钧儒的意见。

“五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的积极响应。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讨论了“五一”号召，一致表示拥护。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合通电，表明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通电认为：中共的这一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④他们还联名致电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寄以殷切地希望和

^{①②} 杨建新，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146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301

^④ 杨建新，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151

信任，对胜利前途充满信心。通电表示：“当此解放军所至，聚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①8月1日，毛泽东复电，对他们积极响应号召，热烈赞同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表示“极为钦佩”。并希望各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者范围及会议讨论的问题，共同研讨，并以卓示。

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和宣言、文章，多次召集有关会议进行研究和讨论，积极参加新政协运动。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高度赞扬中共“五一”号召，表示拥护“五一”号召。民盟在致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暨全国同胞书上指出，中共的“五一”号召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要求，“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即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民进宣言指出：“五一”口号“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历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②民联宣言指出：“五一”口号“是民主统一战线争取革命胜利的具体指针”。^③民建章乃器在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发言说：中共“五一”号召的中心意义是扩大影响和扩大阵营。农工民主党认为，“五一”号召是加速胜利有力的号召，亦即是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巩固和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必要步骤，实现新中国的正确途径。致公党宣言赞扬中共的号召是“富有变革历史意义的贡献”。^④台盟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在这时候，中共中央发表了这个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⑤号召台湾同胞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⑥。九三学社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但到了1949年1月26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后，他们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拥护新政协宣言》。这表明，所有民主党派都在宣言中表达了对中共“五一”号召的坚决拥护。

^{①②③④⑤⑥} 杨建新·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149、158、161、163

第二，阐明了“中间道路”行不通。民革的声明指出：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民联的宣言强调说：在反革命的反民主的独裁路线与民主统一战线的尖锐斗争中间，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并且号召应该积极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民进的宣言亦指出：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先后发表了《自由主义的批判》、《伪自由分子的两条道路》、《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等文章，批判“中间道路”思想。

第三，表示拥护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民进明确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①致公党公开声明：“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②民进还主张“新民主主义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最高施政原则。”^③

第四，阐述了新政协的性质、特点和任务。民主党派认为新政协与旧政协有着本质的区别，“新政协是与人民直接发生血肉关系，有着更深切的全国性和群众性。”“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基础是以革命爱国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组合构成”。^④它们强调：决然不要代表地主买办豪门资本的反动独裁集团来参加，决然不要侵略主义者的美国来过问。各民主党派指出，新政协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这个政权应由共产党领导，要制定一个共同纲领，它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各民主党派还主张，新政协运动应与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密切配

①②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553、642

③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553

④ 杨建新，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172

合。此外他们还就新政协会议召开事宜提出下列建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改为“全国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在新政协筹备单位中增加致公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同意他们的上述意见，并作出答复。

在整个新政协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密切与中共联系，共商国家大事，充分体现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携手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正如农工民主党在1948年9月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的：“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①

为做好民主党派的工作，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东北局及其他各地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确解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具体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在强调说明各种重大成就时，并应指出困难和缺点，以及我们依靠群众力量，虚心学习等克服困难和缺点的方法。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意见和批评，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中共中央这个指示的贯彻落实，将有力地促进新政协运动的发展，更好地与民主党派合作。

为了更好地协商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备建国工作，中共中央邀请在香港各地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南方局和在港中共代表进行了精心和周密的安排，先后护送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350余人分20多批秘密离开香港，转到华北、东北解放区。他们的到来，受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和地方党组织、群众的热烈欢

^①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307

迎。

以上事实深刻的表明，各民主党派已由不自觉地接受中共的领导，上升到自觉地接受中共的领导。一方面说明中共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以自己的先进性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尊敬和信赖；另一方面说明，各民主党派能够正视现实，追求真理，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而不断的进步。

二、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一）继续推进反美反蒋帝国民主运动。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日益暴露出腐败无能。为了维持这个反动政权，美帝又开始了新的侵华阴谋，即扶植桂系李宗仁以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政权为了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更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大规模的残酷的镇压。同时，为了粉饰其独裁统治，决定1948年为所谓“行宪年”，所谓“行宪就要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1948年4月19日，“国民大会”举行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仍然玩弄着换汤不换药的把戏。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1947年赤字高达87万亿元。巨额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因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1947年12月，物价较抗战前夕增长了14.5万倍，而职工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这样城市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极其痛苦。国统区农村成了饥民遍野，饿殍载道的人间地狱。国统区的经济危机，把各阶层人民推上了饥饿和死亡的绝路。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领导的国统区民主运动更为广泛和深入，且具有短兵相接的特点。1948年2月，北大、南开等学校学生开始争取全面公费的斗争，平津大学的教授也提出改善教师生活待遇的十项要求。4月初，平津的各院校和北平研究院的教研人员和职工，提出“向政府要饭吃”的口号，举行罢教、罢研、罢工。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民

主运动的发展。

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同时，中国人民对战后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无视中国民族权益的积愤，终于爆发出来。1948年五四青年节，上海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并通电全国，号召开展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各地名界纷纷响应，很快形成全国性的运动。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惊慌之余，公然恫吓说：运动“倘使仍继续进行，可能招致不幸结果”，妄图阻止运动的深入发展。国民党政府更是杀气腾腾，叫嚷对革命群众，要“操刀一割，斩草除根”。美国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及其恫吓人民的行径，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一个更大的反美抗日运动在全国兴起。一些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士，通过揭露美帝扶日的罪行，激发了民族义愤，认清了美帝与中国人民一贯为敌的反动本质。一些社会名流、学者也纷纷致书司徒雷登，指斥其干涉内政、扶日援蒋，反对中国人民的行径，表示：我国人民愿意跟外国人友好，……可不愿意让别国的特殊势力踏在脚下，喘着气当奴隶。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贫病交加，宁愿饿死，也不去领美国的所谓“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帝的坚强决心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反美抗日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司徒雷登极为不安，惊呼：“这么多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①

在民主运动日益高涨之时，各民主党派积极投入到汹涌澎湃的反美反蒋斗争之中，与中共在政治上的合作更加密切。这个时期，民主党派开始学习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拥护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民盟上海支部和南京支部在1948年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上海支部还学习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民盟苏州等支部出版小报，刊登解放区的

^① 司徒雷登1946年—1948年致美国国务卿的若干电文（叶笃义译注），载历史研究（杂志），1982年第3期。

消息和中共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何香凝曾在民革会议上大声疾呼：“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①1948年4月9日，在纽约的冯玉祥应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请求接见了。此人提出要冯玉祥“回国去收拾局面”，并说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美国政府就不要蒋介石，还愿意帮你们民主人士的大忙，要钱给钱，要军火给军火。美国企图以民主人士的力量阻挡中共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当即遭到了冯玉祥的拒绝。民主党派人士学习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后，受到很大的启发与教育。黄炎培说，未读毛泽东文告前，对中间人士的前途感到悲观，读后始觉释然。中共并未拒人于千里之外。两大局面已成过去，今后只有一大了。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二）各民主党派积极支持解放战争。

当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接近决战的时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各种方式声援和支持人民革命战争。1948年初，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司徒美堂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祝贺解放战争胜利，衷心希望中共“领导军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接再厉，务使完成革命之大举，以慰四万万五千万父老同胞之期望。”^②农工民主党于1948年9月在香港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中提出：“本党应加紧团结南京统治区的工农平民大众与解放军并肩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应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武装。中共拥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我们必须尊重中共战友，按照实际需要，统一指挥，巩固合作。”^③民革主席李济深说：我们应该去尽力瓦解蒋介石的军队，来配合中共的军事进攻。很多民主党派还专门讨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问题。这反映了各民主党派信任共产党，与共产党共同奋斗

^① 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6期，第27页。

^{②③} 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343、307

的决心。尤其在行动上，他们通过策动蒋军起义、搜集军事情报、参加武装斗争等方式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第一，策动蒋军起义。

民主党派利用其成员和国民党军队中一些高级人员有联系的便利条件，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争取他们起义。民革专门成立了由李济深、蔡廷锴为首的军事小组，设立秘密机构，与中共华南局、中原局取得联系，配合进行策反工作。李济深还给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写亲笔信件，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转变立场，站到民革方面来，或举行反蒋起义，或暂时保存实力，不再为蒋介石卖命，给自己留下后路。各民主党派还发表告本党同志书或宣言，揭露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的罪行，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率部起义。他们的宣传鼓动对于瓦解蒋军、争取国民党内部力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军政界的人心更加动摇，不少人与民主党派联系，以求立功赎罪，站到人民一边来。

在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率部2万多人起义，他的策反工作是由农工民主党、民革派人配合中共进行工作的。平津战役中，共产党和解放军派人与傅作义将军直接谈判成功，有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牵线搭桥，配合工作的功劳。民盟、民革成员在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策动四川国民党军队负责人刘文辉等率部起义。民革还先后策动了上海国民党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和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署副长官、第19兵团司令兼河南省主席张轸的起义，对上海和武汉的解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农工民主党策动号称“御林军”的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在南京起义，争取了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警卫长和两个警察大队长暗中投向人民。尤其是“御林军”师长的倒戈，影响很大，动摇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军心，加剧了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全国各地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各次战役中，还有不少国民党将领、军政人员起义。这些人上至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主席，下至警察总

队长、县长。

上述策反工作，民主党派有的是接受中共的任务，有的是先征得中共的赞同，经策动成熟，再介绍与中共直接联系，具体安排起义的时间和办法。民主党派的这些工作，毫无疑问对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搜集军事情报。

民盟湖北省支部搜集武昌营房卷册和武汉城郊城防工事蓝图，及湖北省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团体的地址和负责人名单、电话名册等情报，送给中共地下组织或解放区。福建省民盟支部派遣盟员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收集军事情况，供给中共领导的福建人民游击队。

农工民主党有一些秘密党员，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担任着各种重要职务，因而在搜集军事情报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从1948年到1949年，运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为中共搜集到敌方的军政情报有：广州绥署的兵力部署情况和作战计划，国防部的重要情况和作战计划，南京市的城防工事地图，军令部的1948年后备兵力统计，南京市的保密局特务名单和活动情况，毛人凤布置追踪曾山的情报，芜湖专署进攻当地游击队的计划，敌人封锁长江的通讯口令，“珠江三角洲反共救国军”的作战计划，军统特务逃往台湾前在南京设下的两座电台，广州地区陆海空军日夜联络讯号表，国民党在复兴岛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的决议，长江江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况，等等。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农工民主党按照中共方面的意见，动员其党员刘宗宽打入国民党重庆行营任代参谋长，在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房显志的指导和配合（房秘密住在刘家）下，迅速准确地向解放军提供了有关国民党西南地区的军事情报，并利用调整部署兵力之机，在川东南的川鄂湘黔交界地带空防，为解放军敞开大门；又利用敌入的矛盾，使国民党当局在情况判断和军事部署上发生错误，粉碎了国民党“保卫重庆大决战”的措

施；刘宗宽还提出先解放贵州，截断国民党军队向云南撤退的后路的建议，为解放军所采纳，一举全歼了国民党在四川的几十万军队。刘宗宽获得了“解放西南第一功”的荣誉。

第三，参加武装斗争。

早在1948年，民革、农工民主党、民联、民促就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他们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迎接人民解放军。民革成员、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王蕴滋，接受民革中央指示，在川西组织武装起义，进行游击活动，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全歼胡宗南、王陵基残部的战斗。

各民主党派还组织和动员国统区民主党派成员和群众去解放区参加军队和建设。上海民盟支部青年盟员有100余人，其中约80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民盟北平支部在1948年组织将近200名盟员知识分子，赴冀中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向浙东解放区输送了上海青年170多人，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了约50人，其中包括教授、名记者、音乐家、舞蹈家等。

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各民主党派利用自己在社会上有广泛联系的优越条件，动用一切力量为人民解放军输送军需物资、医疗器械和药品。如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曾接受浙东解放区和苏北游击队的委托，在上海设法代购武器、弹药和药品，并将买到的物资护送到北火车站，交给地下工作人员，再由他们运往前线。民盟湖南支部给宁乡游击队送去收发报机一台和药品两箱，支援游击队的斗争。安徽省民盟安庆市分部，应解放军的要求，动员了1000多只船，帮助人民解放军渡江。

在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斗争中，不少民主党派成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鲜血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一起，在追求民主自由、人民解放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之，人民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鼓舞了各民主党派广大成员的斗争信心。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坚持国统区的斗争，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前方、后方相互配合，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新中国诞生

（一）民主党派坚决拥护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第三年后，敌我力量对比朝着更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到了1948年秋，出现了对革命更为有利的形势。人民解放军增加到280万人，已经拥有强大的炮兵和工兵，经过新式整军和战争的锻炼，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士气更加高涨。东北、华北、中原解放区三大片已连接起来，解放区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24.5%，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5.3%，解放县城以上大小城市586座。1948年9月，敌人防卫坚固的济南城被解放军攻克，这表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的空前增强。而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365万人，但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170余万人，士气极为低落。敌军已被分割在西北、华北、中原、华东和东北等5个战场上的少数孤立城市中，加之内部矛盾重重，政权岌岌可危，被迫采取重点防御方针。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人民反对美蒋的斗争不断高涨，使敌军后方极不稳固。而解放区土改和新式整军运动已基本完成，后方更为巩固。这一切表明，战略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抓住有利时机，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先后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三大战役后，蒋介石已无力阻止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为了争取时间，卷土重来，蒋介石一面组织残余力量凭借长江天险和边远省份顽抗；一面进行“和谈”欺骗，企图阻止解放大军渡江彻底埋葬蒋家王朝。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提出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的条件下同中共进行和平

谈判。国民党的一些实力派和资产阶级右翼也企图使中国革命就此止步，希望出现“南北朝”或“三分天下”的局面。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面临着重大抉择。为了使全国人民保持清醒头脑，不上敌人和平欺骗的当，毛泽东在元旦献词中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元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解放全中国。但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早日结束战争，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代表中共宣布了8项和平条件：①惩办战争罪犯；②废除伪宪法；③废除伪法统；④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⑤没收官僚资本；⑥改革土地制度；⑦废除卖国条约；⑧召开没有反动份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中央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和实现和平的8项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赞同。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表明自己的态度，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53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快要土崩瓦解了”，为了苟延残喘，搞了和平阴谋，“以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或边远省份作最后挣扎”。因此，“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亦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①他们在《意见》中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②这表明，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①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506、505

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还分别发表声明、宣言和谈话，表明自己的主张。

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平攻势的同时，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对美帝继续援助国民党和妄图干涉中国革命的行径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9年2月3日，民盟、民革、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进、民联和致公党，为美国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国务卿向国会提出援华法案一事发表联合声明，严正指出：南京独裁政府违法摧残民主政党、逮捕学生，执行内战政策，早已不能代表民意，已为全国人民所反对之政府。美国政府如再继续积极援助南京政府，是助长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坚决反对此种加深中国人民痛苦之对华借款，同时绝不承认南京独裁政府所签订之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卖国条约。1949年4月4日，美国等12个西欧和北美国家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这是一个挑动新的世界侵略战争、危害人类和平安全的条约。为此，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发动侵略战争，并作坚决的斗争，打败侵略者。7月7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团体联名发表《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严厉谴责美国在抗战胜利后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同时指出，“侵略中国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正在控制着日本”，“使日本反民主化，继续军国主义化”，“美国政府的这种反动政策，直接威胁着中国人民，也直接威胁日本人民”。^①《宣言》表示了中国人民“为打倒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奋斗”。^②

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在白皮书和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里，充满了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以及对于中国人民的恶毒污蔑和深刻仇恨。由于杜鲁门、艾奇逊为了说服对手，不得不在白皮

①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569、570

书中公开暴露若干反革命的真相。这就使白皮书在客观上成为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自供状。为了利用这部反面教材教育人民，特别是争取那些对于美国还抱有幻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先后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6篇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号召人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民主党派也站在中共一边，纷纷批判白皮书。民盟于8月16日在北平举行批准白皮书座谈会。民建发表了《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指出：白皮书上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的工具，它的历程是艰苦的，可也正是这样的考验，改造了、提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品质，它也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终于获得解放，以绝望中复苏回来。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声明表示：谢谢美帝的提醒，我们应该大大加强内部的团结和警惕，并严正宣告，我们还得准备斗争。中共高度赞赏民建的这一积极的有原则的声明。毛泽东两次写信给民建领导人黄炎培，称民建的声明是“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①

以上事实，一方面表明各民主党派和中共在反帝斗争中，紧紧地站在一起，团结一致，革命统一战线十分巩固；另一方面表明，各民主党派抛弃了“美苏平衡”的一贯主张和对美帝的幻想，完全接受了中共的对外政策，公开地与美帝国主义决裂，坚定地站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上来。这是民主党派政治上的又一重要进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在全国人民的谴责和国民党内部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1月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333、335

宣布“引退”，第三次下野，由李宗仁代理伪总统。但“引退”后的蒋介石仍然操纵着国民党的一切。李宗仁表面上愿意以中共8项条件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于是从4月1日起，国共两党代表在北平开始谈判。在同一天，南京学生6000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8项和平条件。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了“南京惨案”，当场打死学生2人，重伤3人，轻伤百余人，逮捕多人。从而证实了其“和谈”的“诚意”。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双方代表拟定的和平协定上签字，宣告了国民党“和谈”阴谋的彻底破产。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①遵照命令，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战略追击。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

在全国解放的前夜，国统区的共产党各级组织领导人民进行迎接全国解放的斗争。各民主党派热烈拥护中共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响应国统区共产党组织的号召，积极投入了迎接全国解放的斗争。1949年4月23日，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在一切解放区，全体人民必须加紧生产，服从命令，动员支前；在解放军作战之界域，及将进攻之区域，所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必须努力动员，迎接解放大军，协助杀敌，并保护一切重要物资免受破坏。”^②同时希望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按照国内和平协定的原则，进行局部和平解放之方法，以减少人民之灾难，而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451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523

与蒋介石共招同一灭亡之命运。农工民主党于1949年2月向全党发出指示：（1）大力开展城市的组织工作和民主活动；（2）掌握地方人民武装；（3）策反国民党军人起义；（4）扩大宣传，安定人心，保护一切地方公物、资产、财物；（5）组织城乡人民迎接解放军战斗。其各级组织，尤其是江南各省市的各级组织，普遍开展了“三护”（护厂、护仓、护校）、“三保”（保产、保资、保物）、“三支”（发动群众为解放军进军修路修桥，筹粮筹草，送鞋送伞）、“三劝”（劝一些工商业者不去香港，劝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不跑台湾，劝一些中上层职员坚守岗位）活动。各民主党派同时大力宣传解放区的政策，安定民心，保护民主力量，营救革命同志；搜集各种政治经济资料，供人民政府接管时使用。

各民主党派在进行这些斗争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的为此被殴打，被逮捕，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民建负责人黄炎培在北平对上海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要求上海人民“快作局部和平运动”。民建的地下组织临时干事会的同事听到广播后，积极为上海解放作准备工作。为此，黄炎培的次子、临时干事会的常务干事黄竞武于5月12日突然被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逮捕，受尽酷刑没有泄漏任何机密，结果被活埋。与此同时，民建会上海分会理事姜化民也惨遭杀害。上海解放前夕，黄炎培等与周恩来、董必武、饶漱石等多次商谈接收上海问题，贡献意见，并致函津沪有关人员，作了具体安排。5月25日，上海还有残敌顽抗，胡厥文立即设法通知朱德禽、何萼梅，将北平送来的《欢迎解放军宣言》，冒着流弹横飞的危险，送至《商报》发表，26日即见报了。这个宣言对上海工商业指出，新民主主义将为他们带来光明的前途，号召他们协助人民的解放事业，支持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在全国解放前夕，民革西南地区的领导人周从化、黎又霖、周均时、王白、李宗煌，民盟成员何雪松、张国雄、胥良、黄细亚、王伯高、杨辅宸，农工民主党党员兼民盟盟员章培毅，民盟中央

委员杨伯恺、于帮齐，民革成员曹立中、王建昌、黎一止等人，先后被敌人杀害。这说明，在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的事业中，民主党派人士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二）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 1948 年“五一”号召发出后，早已进入了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就和中共代表一起，为新政协的召开作了种种准备。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和日益发展的统战工作的需要，1948 年 10 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为中央统战部，任命李维汉为部长，高文华为副部长，在党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1948 年 11 月 25 日，中共中央代表与已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就新政协的性质、任务、参加单位等方面进行了充分协商，达成了一致协议。

1949 年 1 月 30 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改在北平举行。中共代表赴沈阳迎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到北平。4 月，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开始进行新政协的具体筹备工作。在这期间，各民主党派总部先迁到解放区，随后迁到北平。

在新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真诚地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和建设，同样离不开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但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对在新政协和人民政府中安排民主人士及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有意见，说什么“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等等。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的干部进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

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①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成为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战略方针。从这一战略思想出发，中共中央谨慎地对待新形势下各民主党派出现的问题。当时，一些民主党派如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进等都发生过对该党存废问题的争论，有的人认为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九三学社还做了解散的准备。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明确阐述了民主党派不仅要继续存在，而且要向前发展的方针。动员和说服要解散的民主党派整顿组织，统一思想，继续存在和发展，与中共一道，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些民主党派经过郑重考虑，多方商谈，同意了中共的主张，并开始着手内部的整顿，以得到不断的提高。救国会经过内部协商，在中共不知道的情况下，自行宣告光荣结束。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它存在的14年中，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上的左翼政党。它的许多成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为人民革命事业壮烈献身，它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不朽史册，为人们永远铭记。

在这段时间里，对于重大政治问题，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人直接商谈，充分交换意见。特别是周恩来，更是经常地、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除个别交谈和小型座谈外，还多次举行报告会，向他们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针对他们的疑虑解答问题。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中国人民解放军等23个单位的代表134人。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务委员21人，推选毛泽东为主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437

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筹备工作：（1）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2）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3）起草新政协会议共同纲领；（4）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5）起草宣言；（6）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会后在筹备会主持下积极进行建国的筹备工作。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又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把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文件。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建国的各项筹备工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代表共662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宗教界等，还有特邀代表。其中党派代表共14个单位，其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为165人。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各推代表18人；中国民主建国会派代表14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派代表12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各派代表9人；中国致公党派代表7人；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各推派代表6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革命大团结的象征，是空前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盛会。因为它实际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因此会议宣布，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它是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成革命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革命的基本胜利的基础上召开的。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

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①中共代表刘少奇发言郑重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入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进行不懈的努力。”“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入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②

各民主党派分别为人民政协开幕致电，表示热烈祝贺。会上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也都先后发言，表达了他们对新中国的殷切希望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宋庆龄指出：“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入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③黄炎培生动地比喻说，我们参加政协会议，是要“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所新的大厦最高的顶尖上边，飘扬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的是什么呢？是新民主主义。”^④陈铭枢指出：“由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我们才找到了这一个根据中国历史发展、适合中国国情于中国入民需要的政府组织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中国独创的，也是最合适的——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制度。”^⑤彭泽民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组织，是适合中国人民需要，是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和建设成功的保证。”^⑥沙千里强调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决不能走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⑦他们一致号召：“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要团结一致，保证长期合作。”^⑧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5、6

② 石光树，迎来曙光的盛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23

③④⑤⑥⑦⑧ 杨建新，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314、329、385、412、424

9月27日，周恩来作了关于共同纲领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制度和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伟大成果。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革命纲领，也体现了各民主党派长期奋斗的目标。因此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赞同与拥护，他们都确定《共同纲领》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①《共同纲领》还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②因而，《共同纲领》又集中反映了进入新民主主义乃至迈进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准则和政治合作的格局。《共同纲领》决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会议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元采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暂定为《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等决议案。

会议还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产

^{①②} 杨建新，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396、479.

生了中央人民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30日胜利闭幕，毛泽东代表全体会议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①政协一届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创造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政治合作的组织机构和形式，正如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中共党组召开的会议上指出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也规定了，人民政协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爱国人士民主协商大事的协商机关。从此这一组织形式和协商机关一直沿袭到现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会议推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恒为最高人民检查署检查长。会议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同日下午3时，北京市各界群众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向全世界震撼人心地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9.

在民主党派和中共携手共建新中国这个阶段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合作发展得很快，各民主党派在中共的帮助下，不仅进行了新的组合，公开与中共全面合作，夺取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开展新政协运动，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时期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的特点是：

第一，民主党派由与中共全面合作到接受中共领导，彻底走上革命道路

这个时期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在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共同政治目标下，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全面合作，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上，而且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动员一切力量，积极投入到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斗争中。同时，各民主党派对美国侵略者的面目有了清醒的认识，由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到对它的失望到与它的彻底决裂，表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又一大进步。

这个时期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的一个飞跃是，他们作出了历史性的正确抉择，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这充分呈现出这样一个历史特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能发展，他们要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而他们争取民主的斗争，光靠他们独立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实践表明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合作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这个时期的斗争还反映这样一个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主党派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光明的前途；而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才能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第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基本形成

由中共和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开创的政党协商制度奠

定了多党合作的基础。经过新政协会议运动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基本形成。它形成的标志是：（1）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在新中国的执政党的地位，各民主党派明确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以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作为多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和行动准则。（3）各民主党派不再是旧中国反动统治下的在野党，他们同中共一道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共同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4）各民主党派基本完成了向新民主主义性质政党的转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型的合作关系。（5）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6）各民主党派受到共同纲领的承认和保护，享有共同纲领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①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有其政治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当然也经过了严峻的考验。最终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②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阶段的宝贵经验，也是党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宝贵经验，还是今后多党合作制完善、巩固和发展的保证。事实上在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如何对待其他党派，尤其是与共产党一起合作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民主党派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是有分歧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党内新的关门主义思想，保证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行。

^① 引自李青，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29—132。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 348。